

制天而用

——读《荀子·天论》

中文系古代语文学组

战国末期，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儒法两家展开了一场哲学大论战。这是当时奴隶主和新兴地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深刻反映。荀况的《天论》是对这场论战作出的战斗总结。它有力地批判了儒家思（子思，即孔伋）孟（孟轲）学派借以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即人定胜天的命题，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旗帜鲜明地解答了人对自然的态度这个历史难题，接触到“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概论》）这一客观真理，是人对物质世界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是人类思想的一次解放。

春秋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日益腐朽和反动，广大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奴隶制已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和复辟自己的反动统治，更加乞灵于他们赖以生存的所谓“天命”。他们拼命鼓吹“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反动谬论。孔伋胡说什么“国家将兴，必有祚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礼记·中庸》）孟轲更进一步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把不断产生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权运动诋毁为“妖孽”，是“逆天”即违背上帝的意志的。为了阐明人定胜天的道理，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光辉论点，明确地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明大自然的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这个规律并不因为有了一个顺天或逆天的人而改变。天只是一个物质的自然。“应之以吉则吉，应之以凶则凶。”吉凶也并不是由于什么“将兴”、“将亡”的“气运”决定的。如果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实行正确的政治措施，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反之，政治措施错误，就会招致灾祸。“祚祥”和“妖孽”与天无关，是由当权者的政治路线决定的。能够正确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人，才称得上顺应历史前进的“至人”。这就把天和入、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区别开来，证明了天是没有意志的物质的自然，从而剥夺了奴隶主阶级的精神武装，从理论上有力地批判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既然天命和入了不相干，那么人对于天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荀况针对孔老二“畏天命”（《论语·季氏》）的反动说教，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战斗口号。在荀况看来，“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是思孟学派欺世网民推行反动路线的思想支柱。

他们只能尊崇天，歌颂天，而不愿也不敢控制自然，驾驭自然，利用自然，使之为人服务。其实，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历史。人类社会就是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人定胜天，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光辉思想。荀况利用了这一伟大成果，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破“天命”，干革命，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有了人定胜天的伟大气魄，才敢于和阻碍历史前进的旧制度开战。荀况“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这一人定胜天的战斗唯物主义思想，是对唯心主义“天命论”的总清算。在此基础上，《天论》具体地解答了有关天人关系上的四个具体问题：

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天管得了人吗？

荀况认为天是天，人是人，天管不了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只要加强农业生产，节约开支，衣食充足，不失农时，遵循正确的政治路线，不犯错误，天是不能使人造成贫困受到损害的。水旱不能造成饥荒，气候反常不能造成疾病，自然灾害也能够战胜它。荀况的看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对传统的陈腐观念来一个倒转，不是“大天”、“顺天”，把人放在从属的地位，而是把人放在主导的、起决定性的地位，“不能贫”，“不能病”，“不能祸”，是对人的力量的充分肯定，人在大自然面前不再是渺小的无所作为的了，而是一个能够改天换地的无比高大的形象。

其次，既然天管不了人，国家的治乱与天无关，那么，造成国家治乱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荀况认为：日月星辰历象，在禹和桀的时代都是相同的；拿农作物来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及土地条件，禹和桀的时代也是一样的。可是禹的时候，天下安定，桀的时候，天下动乱不安，可见“治乱非天”、“治乱非时”、“治乱非地”。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妖”。他感叹地说：“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就是说，在已经发现的事物中，人妖是最可怕的。什么是人妖呢？一是倒行逆施，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饥馑，失去了民心，这叫“政险失民”；二是政策法令不明确，各种措施不合时宜，这叫“政令不明”；三是不按新兴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办事，搞乱了人和人的关系，内乱外患，同时并起，这叫“礼义不修”。他大声疾呼：“三者错，无安国。”三种情况交替产生，国家是不会安宁的。

荀况笔下的“人妖”，实际指战国末期一些国家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政治。他沉痛地说：“其说甚尔，其灾甚惨。”这就是不远的现实，灾祸乃如此惨重。他给我们勾画出一幅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夺权的国家里奴隶主复辟势力重新上台以后十分险恶的复辟倒退的可怕图景。

再次，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应该怎么办？

天既然是没有意志的，也就根本没有什么天降的“祲祥”和“妖孽”。自然灾害和国家的治乱根本挨不上边。他说：“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发生日蚀月蚀、水旱灾害以及出现彗星等，是哪一個时代都会有的。如果执政者路

线正确，政治清平，即使这些现象同时发生，也没有什么关系；反之，即使这些现象一个也没有发生，也没有什么益处。荀况这一段十分精采的论述，很好地说明了成事在人、人定胜天的道理。

最后，人对自然的正确态度是什么？

荀况面对思孟学派“知天”的挑战，一方面提出“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反对他们把物质的自然当作天神看待；另一方面认为作为物质的天又是可知的。大自然有它自己的规律，人不能改变这种规律，但能根据客观规律去利用它，这才算是知天。

天不仅可知，还“能参”。所谓“能参”，就是说人如果运用自然赋予的职能，正确对待天时地利，充分发挥自然的功能，参与自然界的化育，便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取得“天地官而万物役”即驾驭天地、驱使万物的积极效果。荀况认为那些“错人而思天”的蠢人，把人事放在一边，只知道仰慕天道，那是失掉万物的本性的。这种作自然界的主人的光辉思想，标志着战国末期我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闪耀出不可磨灭的光辉。

人定胜天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存在阶级的社会中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内容。历代的进步思想家从人定胜天的思想出发，引申出一条重视人的作用、坚持前进、坚持革新的思想政治路线，对历史起着进步作用，对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抗震救灾斗争，仍有借鉴意义。

唐代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柳宗元，不仅写了战斗的哲学论文《天说》，强有力地批判了保守派韩愈鼓吹的天能“赏功罚罪”的谬论，为王叔文、王伾的变法革新路线申辩，而且在《非国语·三川震》一文中指出周大夫伯阳父把四川地区发生大地震看作国家灭亡的预兆，不是无知，便是愚蠢。柳宗元认为，山河是天地间的自然物质，河水涸竭，大山崩蹋，是地质内部矛盾运动斗争的结果，与国家兴亡根本没有关系，对地震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他的战友刘禹锡在《天论》中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著名论断，阐述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认为：“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治路线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人们就能够胜天；政权没有掌握在革新派手里，法制松弛，是非颠倒，佞人得赏，好人受罚，“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治路线得不到贯彻，反动派就会利用“天命”，反对革新。指明了法治路线的推行，是人定胜天的关键，发展了荀况的《天论》。

在阶级社会里，人与自然的斗争，总是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相连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和复辟狂，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达到其复辟倒退的罪恶目的。北宋时期王安石实行变法革新的时候，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就跳出来利用自然灾害进行猖狂的反扑。被司马光捧为“勇决”的范镇上疏神宗，胡说“天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是由于什么“民劳”，要宋神宗罢除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来“安民心”（《历代名臣奏议》卷266），被司马光吹捧为“公直”的程颢也以“天时未顺，地震连年”进行恐吓，要神宗“仰天意，俯察人事”（《二程遗书》卷39《再论新法乞责降疏》），罢除新法。王安石用“天变不足畏”的战斗口号，对这些奇谈怪论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他指出：“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是畏忌。”（转引自《司马温公传家集》卷72），给了

这伙复辟派当头一棒，维护了新法。当然，荀况、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等作为地主阶级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是有其阶级局限的。他们心目中“人定胜天”的人，指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和后来的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力量；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对地震的原因也不可能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今年七月，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北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病中十分关心抗震救灾情况，亲自领导着这场气壮山河的斗争，并且派出了以华国锋同志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满怀无产阶级的革命深情，昼夜办公，迅速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英雄的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一起英勇奋战，取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随后，我省松潘、平武地区也发生了强烈地震，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损失很小。事实雄辩地证明，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胜利前进的英雄人民，任何严重的自然灾害都是可以战胜的。这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谱写的又一曲人定胜天的凯歌。

但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只顾自己篡党夺权，对这场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采取了极其恶劣的态度。他们不但诬蔑抗震救灾是什么“不讲阶级斗争为纲”，蓄意进行破坏，而且还企图借地震大作文章，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姚文元幸灾乐祸、别有用心地抄引了太平天国时候的一首诗：“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心任逍遥”，并下令要别人写进一篇文章里，暗示地震发生，他们改朝换代的时机已经到来了。铁的事实证明，他们是不顾人民死活的害人虫，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荀况斥责的“人妖”就会重新出现，就会发生历史的大倒退，中国人民将会沦入极大的苦难之中。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代表全国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一举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真是大快人心！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